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3, No. 5, December, 2010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国际问题

国际教育: 自由市场式之外的可能.....	177
扩招意味着不公平.....	180
数字时代的亚洲大学出版社.....	183
MBA 排名之感.....	185
教师对学科与学校的忠诚度.....	187

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

关于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国际探讨.....	189
哥伦比亚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	192
中东欧私立高等教育的沉浮.....	193
泰国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	195

印度高等教育

印度的新高等教育认证法.....	197
印度: 不完善的改革计划.....	200
印度喀拉拉邦: 高等教育的公平困境.....	202

新书简介.....	206
-----------	-----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琪
编辑：吴燕

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号：
沪（K）第 0621 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7986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jihe/index.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7986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jihe/index.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国际教育：自由市场式之外的可能

Peter Scott

英国金斯顿大学校长，曾任《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编辑

电子邮箱：p.scott@kingston.ac.uk

学者流动和国际教育是“好事”这一被普遍认可的假设可能需要定期检验，以确保：第一，国际教育的概念中完全吸收了国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教训；第二，更为重要的全球化的经验教训，已经被国际教育政策所采纳。仅仅把国际教育定义为以巨大的国际与洲际流动或者大规模学生流动（也是全球化最生动的例证之一）为特征的大众化过程是非常不够的。经济移民和政治避难的浪潮不断增长，信息技术颠覆了延绵数世纪的陈旧时空观念，然而基于这两者对国际教育进行的讨论仍然比较少见。

大众化高等教育

高入学率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几乎已成为所有发达社会的主流形式，并且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益。传统的学术科学文化已经被侵蚀，越来越多的学习不是在校园中进行的，而是在社区、工作场所或者居民家中进行的。同样地，研究（或者更宽泛的说“知识创造”）也走出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大部分高等教育体系不仅经历了数量增长（学生和院校数量），也在价值和伦理方面经历了质的变革。整个高等教育的“习性”正在改变，变成了一个既社会化又学术化的企业；或者反过来说，它成为了整个知识服务产业的一部分，在知识经济的供应链中生产技术娴熟的劳动者和实用

的知识。

学生构成

学生构成的变化是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拥有数量庞大的学生，从至少占适龄入学人口的1/3到超过一半不等。高等教育的入学，特别是进入顶尖大学仍然是不公平。这一事实不应该再被用来掩盖高等教育中社会变革的规模。如今，学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他们不再是远离普通大众的精英群体。当然，高等教育社会基础的改变，也反映了过去半个世纪欧洲社会的广泛变革，比如传统的阶级差别的消失（部分原因在于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传统“无产者”工业的衰落以及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文化。性别关系和女性地位的变化，是这一社会变革中令人瞩目的方面。大多数社会都变得更加开放，更富于流动性。

然而，留学生的状况却与此不同。比起本土学生，留学生中来自有特权家庭的比例更大，很多人还抵制欧洲那些深入进行民主化的社会（不仅仅是大众传媒、国际品牌等肤浅的民主化）。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留学经历会加强其已有的特权，对其中很小一部分人还可能有非常激进的效果。有些留学生的输出国虽然接受经济现代化和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却抵制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国家的社会解放，甚至认为那是道德沦丧。因此，本

土学生和留学生的情况，在高等教育和社会中经常是完全不同的。

智力基础

高等教育的智力基础也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产生了变化。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基于项目的评估等新形式已在教学中普及。本土学生对此都已熟悉。然而很多留学生，甚至于他们的父母以及资助人，却并非期望如此。他们倾向于更传统的教学形式，而不是更开放的学习方式。有些甚至将这些更开放的学习方式与所谓的西方道德沦丧联系起来。留学生青睐的学科也有所不同，往往更倾向于工程、计算机以及工商管理，而非人文学科或更具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分歧油然而生，开放式学习与批判性学科深受本土学生欢迎，而传统教学与专业性学科更受留学生青睐。更进一步的差别在于，留学生招生是典型的市场竞争，而本土学生招生则仍主要被看做是公共利益。这些不谐音也许证明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即认为国内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张和国际教育的增长都是强有力的自由化形式——需要被修改。可能更好的描述是：具有高等教育大众民主化特征的社会解放和高等教育中影响国际教育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对立的自由化形式。

全球化

就大众化高等教育而言，可能很少被与国际教育联系在一起，或者就是没有被联系在一起。而对全球化而言，全球化与国际教育可能被联系得过于密切。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经常被简单地认为：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国际教育的发展是这股力量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全

球化并非必然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至少从其新自由主义的表现来看），或者全球化与国际教育的联系可被视作为全球化的偶然现象。现在的趋势是大家都认为全球化的发展道路是单一的，也就是认为国际化的必然轨道便是通向自由市场式的资本主义、大众传媒文化、国际品牌以及多党民主。事实上，全球化有多种形式，其未来也远比上述的单一道路理论更为多元。

即便是单一道路的全球化，其实际情况也比全球化刚出现之时更为复杂。对有些人来说，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可以在全球寻找工作机会；即使不在国外工作，巨大的全球附加值也加强了他们国内工作中的主导地位。而对其他人来说，全球化可能意味着被迫经济移民，熟悉而稳定的社交网络变得不稳定，甚至于和亲朋好友分离。对有些高校，特别是西方最成功的大学来说，全球化提供了公平而绝妙的机会——与其它国家志同道合的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在全球大学联盟中建立声望（作为国内高校等级的延伸，虽然可能会受到进步社会政策的削弱），在国家经费受限时获得替代性的收入来源，甚至是一种可延伸至大学其它部分的创业新模型。而对其它高校来说，全球化当然是一个威胁：它们的学术活力枯竭了，因为它们最有前途的研究人员出国了；它们的学术标准（甚至国家价值）被质疑，因为众多国际机构的团队已经设定好了市场政策和替代策略。即便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互换一下，如此种种自由市场式全球化的结构性不平等仍将存在。这些结构性不平等是全球化 DNA 的一部分，已深深植根于全球化的骨子里。

将权力中心置于世界各大城市高耸夺目

的摩天大楼之中的单一全球化是不存在的。全球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些形式是激烈冲突的。比如抵抗自由市场式全球化的就有好多种，像全世界的环保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已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即使是在那些有着陈腐政权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新兴运动所建立的全球网络至少已经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网络同样密集而成熟了。尽管国际学生与教师在这些新兴的全球社会运动与政治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将全球化与

国际教育（和学术流动）以其他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有时仍让人深感不安。许多人虔诚地认为，对国际流动性给予全球知识经济的贡献需要更深的理解，而国际学生和教师流动在新兴全球化运动中的作用或许至少与这种虔诚的坚持一样重要。这种作用也许与大学核心价值的关联更为紧密。总而言之，如何更积极地应对其他形式的全球化，并在这一进程中更进一步理解国际教育，是当务之急。

扩招意味着不公平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扩招意味着不公平的论断好像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这种现象已是随处可见。学生和学校在迎合大众化招生的同时,其质量、教育设施、教育项目与精英型高等院校有差别巨大;而随着全世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升,这一鸿沟还在逐步扩大。进一步讲,对于全球大多数学生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了中途辍学率。所有这些后果都是既不可避免,也顺理成章的。笔者在此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针对扩招,而是为了呼吁人们更加现实地理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影响,改善在校生人数激增所导致的种种问题。

大众化高等教育现在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全球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在过去十年增长了53%,达到了1.5亿人的规模。相比于2000年19%的适龄人口进入大学,现在这一比例达到了26%。在富裕国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超过了50%,有些甚至超过8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在显著增长。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获得了普遍赞誉,因为它使得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得到增加,国家的知识经济得到发展,全球的技能水平得到提升。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极有可能比过去一千年的总和还要多。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已从实现了高入学率的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

家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事实上,在未来几十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主要将发生在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数约占全球适龄人口的23%,印度则占约12%。高等教育入学率最低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2007年仅有6%的适龄人群进入高等院校,虽然该地区的高等教育一直在进行扩招,但却是长路漫漫。

扩招的后果

扩招给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变化,具体的影响和状况因地制宜,但所有的国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财力资源更丰富、对高等教育投入更强、入学率增长曲线更缓慢的国家,可能会比其它国家受到的影响少一些。然而,影响是普遍存在的,与决策者以及高等教育界息息相关。

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不仅数量在扩大,学生个体的情况也更加多样化。以前,大学只培养小部分精英——通常不到适龄人口的5%。这些学生毕业于一流的中学,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家族。高等教育的扩招向年轻人敞开了高等教育的大门,现在的学生来自各种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有的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有的是家庭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高等教育扩招之后,最大的变化之一,便是女性入学人数的增长。在许多国家,女性已成为高等教育在

校生中的大多数。如何为这些背景各异且没有受过高水平中学教育的学生服务，的确富有挑战性。为多样化的学生服务通常比培养少数精英更为昂贵，因为需要提供辅导、咨询及其它服务，但这些往往都是缺乏的。曾几何时，大学预设自己要培养的是精英学生，他们都受过高质量的中学教育并已做好学术研究的准备。然而扩招给大学运送了大量既没有学术背景，又没有学术能力的学生，而这曾经是入学的基本条件。

显然，扩招需要更多的设备设施。现有的高校扩张了，新的学校建立了，但依然无法满足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学生学习条件的恶化即使算不上普遍，也依然屡见不鲜。校园中人满为患，图书馆及其它设施缺乏，无法向学生提供毕业所需的课程，这些都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情况。

高校教师这一职业已经被拉伸至极限。全球的高校教师中，近一半人只有学士学位。班级的规模增大之后，学生几乎得不到教师的关注。高校教师的薪酬待遇不断恶化，许多教师必须身兼多职以求生存。扩招也许为学生带来了更为糟糕的学习环境，其中部分原因便是高校教师的发展跟不上学生数量的扩张。

高等教育的入学需求使得许多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了起来。政府已无力为扩招的公立高校提供经费，私立高等教育则因此填补了空缺。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二十年前曾是公立高校的天下，但如今在私立高校就读的学生占一半甚至更多的比例。大部分新的私立高校是“需求吸收”（demand-absorbing）型的，其质量通常很差，对入学的学生没有任何挑选，除了提供一个

学位之外，几乎别无它物。这些学校有很多都是逐利而生的。许多家庭里供养出的第一代大学生，因为无法进入公立高校，而不得不选择了这种私立高校，所缴纳的学费则通常更为昂贵。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催生了对质量保证与认证的需求，然而极少有国家可以建立并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以确保教育质量。这种状况意味着至少在现阶段，大部分高校的教育效果是不透明和未知的，特别是那些服务大众客户的学校。

入学人数的增长也引起高等教育中肄业率的显著增长。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建立了第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并拨付大量资源的国家，用超过四年这一标准时间获得学士学位或者没有获得任何学位的学生比例也显著上升了。许多国家无法应付增长的需求，例行公事地将很多学生作退学处理。

扩招增加了社会、家庭和个人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成本支出。在世界许多地方，增加的成本落到了那些承受能力最差的人身上，比如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政府无法为高等教育的扩招提供经费资助，因此提高了学费，或者将扩张转嫁到私立高等教育中。

不可避免的不公平

在财力受限和成本增长的扩招时代，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大部分国家已经或正在建立分类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需求。这一过程既不可避免，也非常有意义。然而在所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往往都服务于精英学生群体，享有较高地位；而地

位较低的高校则满足那些不能进入顶尖大学者的需求。它们之间在国家经费、教学质量和设备设施上有重大差别,且差距正在逐步扩大。由于财力和人力限制,高校间的不公平状况将持续下去。今后,接受高等教育者的背景将更富多样性,在许多方面也会更难以得到有效服务。

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构成了21世纪

高等教育的深层矛盾。随着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不公平也在增加。许多学生的学习环境恶化,很多人拿不到学位。人们所预期的高校学历为个人带来的经济利益极有可能下降。但总体而言,入学人数的增加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依然是全世界各国和地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必然目标。

数字时代的亚洲大学出版社

Paul H. Kratoska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社长

电子邮箱: kratoska@nus.edu.sg

亚洲和西方的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学术资料。它们的商业诉求有限,都面临着销量下降、成本上升以及教材电子媒体化所引起的普遍问题。尽管如此,北美大量的大学出版社还在为那个萎缩的市场竞争。而在亚洲,出版市场持续增长,特别是英语出版物的市场。电子出版物已在亚洲出现,但其效果还难以预测。

1950年,北美有超过60家大学出版社,而东亚只有12家。当时东亚大部分的学术出版物是由商业性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东亚的大学出版社蓬勃发展。现在,中国有110多家大学出版社,韩国有70多家,日本有30多家,东南亚则是几乎每所重要的大学都有出版社。

东亚的大学出版社在蓬勃发展之时,北美的大学出版社却陷入了困境。每本书的销量降低到500册甚至更少,学术出版危机的说法盛传。为了应对危机,商业性学术出版社将每册书的价格提高到150美元甚至更高,但几乎只能卖给图书馆;而作为非营利性教育出版社的大学出版社,则试图维持更加实惠的价格。为了赚钱,一些大学出版社也出版商业性刊物,如大本精装书、烹饪书籍、远足指南、观鸟手册等等。大学出版社也开始要求作者提供出版费,以支持其著作的出版。

亚洲的趋势

东亚的众多大学出版社有着不同的运行基础。在中国,大学出版社需要自己负担大部分开支,并为学校做出财力贡献。它们的出版物主要是课本和一般读物。对于学术研究著作,则由作者承担出版费用,经费通常由大学拨款提供。在日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发行主要由基金会、大学科研拨款,或者政府机构(例如日本学术振兴会,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提供资助。而东南亚的大学出版社则参照美国模式,依靠售书和大学拨款生存。

东亚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焦点正在发生变化。虽然课本现在依然很重要,但科研出版物所占的比例在日本已达80%,在韩国和中国则约占50%。这类出版物采用亚洲语言,其销售也限制在国内市场。不过,那些展现出卓越学术成果的最优秀书籍,也应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如今,亚洲的一流大学致力于在科研上满足国际标准,以便提高大学的名望来吸引科研拨款和政府经费,督促教师提高国际显度。大学排名,例如泰晤士报的“全球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学校获得国际认可提供了途径,并为大学管理者所接受。由于教师科研论文的发表是决定大学名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

大学对科研也越来越重视。

汤森路透公司的科学引文索引是衡量学术质量的一项标准，一些亚洲大学对在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约12,000种期刊上发表文章高度重视。例如，马来亚大学规定，学术人员在这些期刊上发表16篇文章，才有晋升正教授资格。这些期刊几乎都是英文的。大学高度重视英文出版物，部分原因也在此。在中国和韩国的大学晋升体系中，用英语发表的学术成果也比用汉语或韩语发表的更有价值。日本的大学对英语和日语的文章和书籍一视同仁，但是资历尚浅的研究者仍有用英语发表学术成果的压力。

在许多学科中，由于西方对引用的重视，使得学术讨论的主要场所从书籍转变到了期刊文章。而在亚洲，这一趋势则不太明显。东亚的学者们继续醉心于写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书籍的价值也胜于期刊文章。

亚洲的大学鼓励其研究者们向久负盛名的出版商投递英文作品。确定哪一个出版社或学术期刊更有名望却困难重重，因为管理者在做决定时既要分学科（数量庞大），还要考虑出版商（大多是西方的）的情况。管理者的两难使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性学术出版社收益颇丰，它们大部分都在西欧，期刊品牌也非常有名。

亚洲的未来

目前有两家亚洲大学出版社——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和香港大学出版社主要用英语作为出版语言。过去十年间，两家出版社

都改变了它们的出版重点，摒弃了过去只重视本土话题的方式，对东亚和东南亚的问题也很关注，以提高国际销量。它们正在努力克服那些认为在西方发表比在国内发表更好的偏见。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学者们对于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影响到更广阔的亚洲市场也很有兴趣，正如他们对把书卖到西方的兴趣一样，他们把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也视为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

电子出版物的发展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东亚的学者们仍旧认为纸质书籍更有价值，并努力出版个人著作。然而，就像在北美大学一样，有影响力的亚洲大学也开始提供可以随意在个人电脑上存取的电子课程资料，学生很少需要去图书馆或看纸质书籍来准备课程作业。如果定价合适，电子资料可能会提升亚洲的总体教育水平，因为亚洲的很多大学还在苦于图书馆设施设备不足的问题。

电子书读者若干年前在北美已经出现，现在也开始在亚洲出现。然而，学者们在多大程度上采用电子书来阅读学术资料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同样尚不清楚的还有电子书读者对学术出版的影响。和其它任何地方一样，亚洲的大学出版社必须出版和销售电子出版物，而它们最缺乏的是发展自己的电子出版资源。通过出版联盟发行电子书也许是一个解决办法。电子书有可能会终结出版市场由大型商业出版机构统治的时代。

MBA 排名之惑

Ricardo Betti

巴西圣保罗专注于人力资源发展之咨询机构 MBA Empresarial 总经理及合伙人

电子邮箱: ricardobetti@mbaempresarial.com.br

MBA 排名, 作为最受 MBA 申请者欢迎的读物之一, 在给读者充分信息以便选择最优教育项目方面, 并没有给读者多少帮助。

根据 23 年入学申请顾问生涯的经验, 笔者有如下建议: 面对众多大相径庭的排名, 读者最好先花点时间分析一下排名标准, 再做出结论, 而不是只看这些肤浅的质量测评。

尽管如此, 要打破阻力, 挑战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 却并非易事, 包括对地球上每一件事物进行无休止排名的习惯。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十大(Top 10)”排名泛滥, MBA 也不例外。杂志间的竞争迫使他们发布各自的排名, 负责设计排名的统计员们绞尽脑汁要做出一个新的排名。这些排名非常没有相关性或者充斥着高度的主观臆断, 对那些满腹疑云、需要从世界上成千上万个教育项目中选择一个好学校的申请者来说, 没有任何帮助。

问题与矛盾

另外, 一些可敬的媒体, 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商业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福布斯》和《财富》等七家报纸杂志, 也投入了可观的研究人力和物力开发、出版年度(或两年一次的)排名, 据称有助于解决“MBA 选择”难题。这些排名在评估了世界上主要的 MBA 课程后, 只能说是给出了一个尚有问题的分类。

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 笔者耐心地将这七个排名中关于最受欢迎商学院的部分进行了匹配, 发现了现有出版物中若干个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例如: 哈佛商学院同时在七个媒体的排名分别为 1、2、3、14、5、3、2。相同的现象也发生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1、6、4、19、7、1、4)、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5、4、2、11、9、5、1)、麻省理工学院的商学院(3、9、8、4、19、14、3)、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5、1、9、9、4、4、6)、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9、7、6、3、20、6、6)以及其它被调查的商学院。

笔者收集了在这七个排名中名列前十的所有商学院的名单, 2010 年有 22 家商学院榜上有名。如果申请者决定只在名列前五的商学院中做选择, 他将有 15 个选项。偶尔到笔者办公室进行咨询的学生说, 他/她想在世界上最好的 MBA 课程学习, 然而仍然有 7 个选项(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伦敦商学院、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西班牙 IESE 商学院以及沃顿商学院)。

排名只能被视作额外的信息来源, 而不能被当做是主要的来源。只有当申请者能探究排名所使用的一套方法并理解不同排名所测评的内容时, 排名信息才是可以接受的。

例如, 《华尔街日报》的排名完全是基于对学生雇主意见的一项调查;《财富》杂志的

排名则基于商学院在雇主中的声誉以及学生的职业生涯纪录。《财富》杂志根据三个方面来确定学校对学生职业生涯影响的分数：毕业三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学生百分比（占20%的权重）、每个学生平均获得的工作机会的数量（占20%的权重）以及学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薪资（占60%的权重）。

《华尔街日报》调查企业雇主的意见，《福布斯》杂志偏重于毕业后薪资，将投资回报作为测评标准，而《财富》杂志的方法则融合了两者。另一方面，《商业周刊》调查商学院在学生中的声誉，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更强调客观数据，如美国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的评分、平均积点、薪资水平等等。《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将美国和欧洲商学院一起评价，分别将西班牙IESE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排在世界第一。

其它影响力较弱的排名试图测评其他的不同属性。世界大学网络计量学排名（Webometrics）测评商学院在网络上的表

现，2009年将麻省理工学院的商学院排在第一；沃顿商学院在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排名上名列榜首，该排名评估商学院对学术研究的贡献；耶鲁大学折桂非营利MBA榜单；麻省理工学院的商学院在技术MBA排名（Techno-MBAs）中独占鳌头；杜克大学的MBA项目在智力资本榜单（Intellectual Capital）上首屈一指。排名榜单泛滥，其造成的不确定性远甚于实在的帮助。

怎么办？

任何理性的人都会拒绝将这些不一致的排名作为可靠的评价工具。不幸的是，大部分申请者都不会对此作科学的分析，而是选择一个排名并将其看作是全部真相，用这个不严谨的工具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笔者的工作之一，便是揭示这一方法的不足，促进申请者对每个商学院尽可能了解更多，并让他们理解自己的目标、动机、需求和抱负，与校友对话，以及在做决定之前、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亲自去访问商学院。

教师对学科与学校的忠诚度

Jesús Francisco Galaz-Fontes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自治大学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Baja California) 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galazfontes@gmail.com

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作用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高等教育在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一系列类似的挑战:人头经费的拨款不断下降、基于学校表现的经费拨款越来越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加;经济的知识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上升;管理主义的程度加强。大学教师的工作前所未有地被置于中心地位,但工作条件的恶化和问责的增加使得教师的业绩压力更大。

20多年前,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曾经写道,学术人员生活在由他们的学科和学校所界定的狭小而不同的世界里。本文讨论的是大学教师的忠诚度和投入度,这是教师工作的关键维度。

国际比较

2007年的“变化中的大学教师”项目(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International Survey)对18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师进行了国际性调查,其中一项调查就是请教师评价一下其学科领域和学校隶属对他们的重要性。调查的结果是:在高等教育体系被认为已“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德国、香港、意大利、日本、韩国、挪威、英国和美国),或者被认为是“新兴”的国家和地区(阿根廷、巴西、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墨西哥、葡萄牙和南非),80%甚至更多的全职教师(除了意大利是78%)

表示他们的学科隶属非常或相当重要。另一方面,11个“成熟”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师在学校隶属上都没有表示出相似的重要程度。而相比之下,7个“新兴”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80%甚至更多大学教师表示他们的学校隶属关系非常或相当重要。

由此可见,所有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师都高度忠诚于他们的学科,在成熟和新兴国家平均比例都高达89%和91%。而他们对于学校的忠诚度则差别较大:成熟国家平均57%的大学教师认为他们的学校隶属关系非常或相当重要,而在新兴国家有78%的教师这样认为。大学教师与学科专业一直以来都联系密切,因此第一个调查结果在意料之中。然而,对于学校隶属关系的不同态度如何解释呢?在这里,笔者采用之前在解释学生国际流动性时用过的“拉-推模型”来探讨。

校园外的影响因素

在成熟国家,有若干因素使得大学教师对当今的知识型和全球化的社会响应更多,因此以学校为中心的程度则有所降低。可以认为是这些因素将大学教师从学校“拉走”。

外部就业市场的诱惑。在成熟国家的大学教师中,更多新聘教师愿意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工作。根据教师们获得第一份全职工作的不同时段分组,9个成熟国家中,有

10%~33%的大学教师在过去五年中考虑过放弃高等教育工作而转行。相比之下,在新兴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有教师表现出类似意向。

科研的跨学校合作。当被问及科研活动时,成熟国家平均64%的被调查教师表示曾与国内其它学校的教师合作过,在新兴国家这一比例是57%。当被问及与其它国家的教师合作科研的比例时,差距扩大了:成熟国家52%的教师有此类行为,而新兴国家该比例只有36%。

国家、文化、经济和学校等可变因素。成熟国家的教师比新兴国家的教师更有可能考虑调动到其它学校,不论是在国内调动(成熟国家32%、不成熟国家22%),还是跨国调动(22%比14%)。与这种潜在移动性相关的是,新兴国家的大学教师有43%拥有博士学位,而成熟国家则是72%。因此成熟国家的大学教师表现得更加外向型,从而可能更少被自己学校所束缚。

校园内的影响因素

高校本身也有一些使教师脱离和“推走”教师的因素。下面几个方面便是这些因素的例子,都与高校中不断增长的管理主义有关,特别是在成熟国家。

就一般情况而言,成熟国家的教师比新兴国家的教师更少考虑学校高级管理者能否提供称职的领导(36%比44%)。与此同时,成熟国家的教师更少关注管理层和教师的良

好沟通(26%比36%),也更少与学校共同决策(26%比35%)。除此之外,成熟国家的教师表示,自己学校有更强烈的绩效导向(55%比45%);而可能与此相关的,他们也更将工作视为重要的个人压力来源(46%比34%)。结果,成熟国家的教师会看到更多累赘的行政程序(63%比52%),而同时他们对于高等教育整体工作环境的改善则感受更少(22%比44%)。

总之,上述大学教师对学校管理的看法并不积极,这的确说明成熟国家的大学教师对学校事务的看法更悲观。他们工作伊始,便更少看到高等教育工作环境的进步,而同时他们看到了更对立的管理环境。这两者使得教师们希望改变,寻求更好的工作环境。

结束语

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间,高等教育的内外环境风云变幻。生活在由学科和学校所界定的世界里的大学教师们对二者的忠诚度是他们对变化的顺应度的晴雨表。正如文中所证明的,教师对学科、(更确切地说)对学校的忠诚度与高等教育的混乱和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对成熟国家的大学教师们来说。同时,他们也表示离开高等教育从事其它工作更具吸引力。未来我们会看到大批教师离开高等教育吗?学术工作的质量会受损吗?我们必须监控这些发展,并从国家层面评估其对总体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与特定的大学教师职业未来的持续影响。

关于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国际探讨

Daniel C. Levy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杰出教授、“私立高等教育研究 (PROPHE)” 项目负责人

电子邮箱: dlevy@uamail.albany.edu

在私立高等教育研究中, 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是普遍的主旋律, 其扩张也有增无减。然而, 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事实却不为外人所道, 增长并非是整齐划一、无所不在、无可避免的过程。历史上, 私立高等教育甚至曾被废止过。如今虽没那么激进, 但各类私立高校都在衰落, 虽然其数量在上升。而最近几十年, 数量上升在公立高等教育中更为普遍。

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原因可以被总结为两大类, 一是社会因素, 二是政策或者说公立高等教育的因素。

社会因素

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认同和特殊性的丧失, 这些曾是私立高校发展的源泉。美洲的天主教认同式微是一个显著现象。即便是在那些仍正式属于天主教会的学校, 其独特的天主教倾向也越来越少被强调。由于宗教背景而选择私立教育的家庭减少了。同样, 随着主流社会对年轻女性越来越开放, 由于性别原因而选择私立教育的家庭也减少了。

另一个引起衰落的社会因素是人口方面的变化, 引发了高等教育总体需求的变化。人口的变化会使高等教育需求发生下降, 或是至少不再增长。这种引起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普遍, 但也有案

例证明 (参见本期关于泰国的文章); 在发达国家, 人口情况的变化却是一个强大的因素。适龄人口的减少对西欧私立高等教育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西欧大部分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规模很小。然而, 拥有西欧最大私立高等教育规模的葡萄牙, 私立高校的市场份额从1996年的36%降至2006年的25%。私立高校的一些教育项目不再具有吸引力, 有的学校面临关门或是合并。在东欧, 私立高等教育的市场份额更大, 因此也更难以抵挡适龄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从1996年到2006年, 格鲁吉亚私立高等教育的份额由34%降至22%。俄罗斯私立高等教育在未来几年也将面临国家人口危机的影响。

日本作为私立高校学生数的绝对值下降的罕见案例, 已经显示出了人口数量停滞的剧烈影响, 虽然其公立高校的学生数量也有类似状况。韩国紧随其后。日本的私立高校中, 较低层次的专科院校受影响最大, 虽然他们在增加非传统类学生数量方面采用了商业手段。不远的将来, 我们可能会看到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困难处境, 一些学校将关门或被合并。

政策因素和公立高等教育的影响

在政策层面, 公共政策对私立高等教育有巨大影响。许多政策是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增长的, 而有些政策则会削弱私立高等教育。

后者所包括的政策有以下四种:

怀着敌意的政府。最极端的情况是政府禁止举办私立高等教育。世界上很多地方,私立高等教育还未出现便被禁止了。共产主义国家(东欧国家和中国)是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显著例子。其它一些左倾国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废止过私立高等教育,尽管这些禁令一般都很短命。而不太引人注目的是,左倾民主国家的政府极力促进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会引起私立高等教育衰落。阿根廷 1983 年的再民主化运动突然放开了公立大学的招生,到 1985 年,私立高等教育的份额从 22%降至 13%。除此之外,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是多方面反私有化的。

政府监管。在有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没有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公共政策的变化也会导致私立高等教育衰落,比如政府加强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监管。在对私立高等教育最初的发展放任自由之后,政府经常会进行“滞后的监管”(delayed regulation)。这种现象在东欧、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很常见。政府出台政策提高许可标准,引入认证措施,或者颁布法律。有时候,由于公立高校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自己的章程、神圣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影响,政府对诸如课程内容等的规定对它们可能没有影响。在泰国、日本、阿根廷和巴西,这类例子屡见不鲜。各种强加给私立高校的规定(例如认证规定)其实更适合用在公立高校身上。通常,公立高校还会向政府大力游说,给私立高等教育设置更多限制。政府设定的学费限额也使私立高等教育在扩大规模时背负沉重的负担。

公立高等教育扩张。如前所述,历史证明,公立高等教育急剧扩张会相应地降低私

立高等教育的份额。在战后美国两年制公立社区大学遍地开花的时候,这一情形也得到印证。哥伦比亚和泰国也显示出了公立高等教育扩张对私立高校的影响。公立高等教育的扩张包括:现有公立高校招生数的上升,新的公立高校不断成立,以及现有公立高校的升级。

公立高校的私有化。公立高校就像其它备受挑战的国有企业一样,可以部分私有化。这是一个迷人的悖论:公立高校通过自我私有化来对抗私立高校。当然,这种自我私有化只是部分的,公立高校几乎从未变成过完全私立的。比起其私有化的必要性,公立高校私有化的愿望很低,只是因为来自私立高校的竞争或来自政府的压力使得公立高校不得不部分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式包括采取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对市场做出更快的反应等。如果公立高校继续保持较低学费或免收学费以及传统地位,他的部分私有化将有效打击私立高等教育。

最引人注目(和令人震惊)的局部私有化可能是开设的二级“模块”(second “module”)。这些专业收取学费,以市场为导向,使得公立学校可以招收更多的学生,在私立高校的领地上与其开展竞争。肯尼亚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该国私立高等教育的份额从 20%左右降到了 10%。在格鲁吉亚,公立高校自费生的比例在 2002 年上升到了 43%,而私立高校的市场份额则减少了。若干所亚洲公立大学现在也开设了二级模块课程。

结束语

种种原因使得许多类型的私立高等教育

都确实实地衰落了。然而, 尽管有上述种种不利因素, 私立高等教育仍在显著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是指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市场份额的变化, 而非招生数绝对值的减少。甚至私立高等教育所占比例的下降也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最脆弱的私立高校类型是需求导向型, 但并非所有的私立高校都会面对不断的打击。不仅如此, 私立高校并不一定就是不幸的受害者, 他们在新形势下招收到了新的学生, 包括来自国外的学生。

同样, 在私立高等教育和公立高等教育之间, 造成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因素与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增长的因素并存。总的来说, 虽然私立高等教育的大趋势仍是增长, 但其衰落仍值得我们对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动态进行认真分析。对于社会如何将其活动分配给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这一重要的传统问题, 如今的高等教育已从公立高等教育向私立高等教育转变给出了答案, 不过这一转变既不是千篇一律的, 也不是坚定不移的。

编著注:

私立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是国际高等教

育的关键趋势之一, 其招生已占到全球高等教育的 1/3。然而, 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或不可阻挡的, 有时会出现停滞不前, 甚至倒退。本期的私立高等教育衰落专题将探究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主要动态(包括原因)。在特定的世界区域或国家, 某些动态会产生最强烈的影响。在一国之内, 我们有时也会看到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总之, 公立高等教育的扩张、教育机构的升格、人口发展的停滞以及公立高校私有化等动态在很多国家都使得私立高等教育的份额增长趋势被彻底逆转。

然而, 要讨论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动态, 需要评估其衰落的模式与程度。不论一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整体上是否衰落, 但其不同的子领域可能会经历衰落。同时, 衰落也会有剧烈和轻微、暂时与长久之分。本期专题的文章显示了私立高等教育在不断发展的宏大现实之下, 也在经历着值得注意的衰退。本期专题由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ROPHE)的博士研究助理 Joanna Musial 策划组织, 联系方式为 jm684672@albany.edu。

哥伦比亚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

Lina Uribe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PROPHE 项目博士研究助理, 哥伦比亚 Institución Universitaria de Comfacaucá 校长; 电子邮箱: lu625667@albany.edu

哥伦比亚的高等教育出现了令人惊讶的现象。高等教育在适龄人口入学上虽然有很大的飞跃(入学率由 2000 年的 19% 上升至 2009 年的 36%), 然而私立高校的招生比例却出现下降。这种衰落出人意料, 因为哥伦比亚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增长是私立高等教育积极进取的结果。事实上, 最近几十年来, 哥伦比亚私立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在拉丁美洲仅次于巴西。

哥伦比亚私立高等教育所占比例在 1996 年曾达到 68% 的最高峰, 然而 2007 年则下滑至 45%, 回到 1970 年的水平。但肯定的是, 由于私立高校的招生数在 1997 年后仍然有小幅增长(1997 年后平均每年招生数上升 8,700 人, 1995~1997 年是每年招收 45,000 新学生), 哥伦比亚私立高等教育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包括招生绝对数量的减少。

公立高等教育扩张

私立高等教育衰落的因素之一是私立高校学费的增长, 降低了公共的承受力、缩小了公私立高校的学费差距。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公立高等教育令人惊讶的增长。1997~2007 年, 私立高校的规模只增长了 18%, 而公立高校则增长了 196%; 在招收的近 59 万新生中, 84% 进入公立高校。

为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 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推动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增长。

公立高等教育实现了成功扩张。相比之下, 政府试图通过给予学生补助来刺激对私立专科教育需求的努力却没有达成同样的效果, 2002~2005 年只有约 7,000 名新生。

未来趋势

哥伦比亚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与拉丁美洲私立高等教育总体扩张(其比例逐步上升到了 49%) 的趋势相反。而且哥伦比亚近年来的衰落形势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格格不入: 智利、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墨西哥、秘鲁与尼加拉瓜的私立高等教育都在增长, 阿根廷、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则保持稳定。

另一方面, 虽然哥伦比亚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持续了整整十年(1997~2007), 但 2008 年私立高校的招生增幅(8.3%) 再次超过公立高校(4.3%)。这与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存在于某些特定时期的国际性发现相符。

哥伦比亚的情况也符合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研究所发现的一个更有普遍性的现象, 即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是发生在规模增长之中的。本专题关于泰国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由于公立高校升格而导致私立高校衰落这一更为具体的原因也适用于哥伦比亚。另一方面, 哥伦比亚的情况与日本等国的案例并不相同, 后者的衰落可以用人口减少来解释。2002~2008 年, 哥伦比亚 17~21 岁人口只增加了 9%, 而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了 44%。

中东欧私立高等教育的沉浮

Snejana Slantcheva-Durst

美国俄亥俄托莱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ledo) 助理教授, PROPHE 项目合作学者

电子邮箱: snejana.slantchevadurst@utoledo.edu

对欧盟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研究表明, 中东欧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与西欧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中东欧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规模普遍更为庞大, 而西欧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大都还处在边缘。2004~2007年, 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10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 之后其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便被置于更广泛的欧洲化与和谐化进程之中。

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 私立高校在中东欧各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起来。后共产主义的欧洲, 私立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最值得一提的是拉脱维亚、波兰与罗马尼亚, 其1/3以上的大学生目前就读于私立高校。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市场份额在7%~21%之间。

十多年来, 中东欧各国政府为了优化高等教育供给, 有意地尝试对公立与私立高等教育进行部署, 各国的私立高等教育规模也显现出不同的变化。最近, 这十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都呈现缓慢增长态势。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 暂时的衰落在私立高等教育的所有或部分领域都有发生。与本专题其它文章提到的案例与趋势相比, 中东欧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在规模上最小, 持续的时间也最短。因此, 不应该认为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非常显著或很持久。

私立大学的招生情况

对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来说, 1999~2009年至少可以被认为是暂时衰落的十年。由于法律的改革而导致私立大学招生规模下降的国家和时段分别是: 保加利亚是1999~2000年, 爱沙尼亚是2002~2003年, 匈牙利是2003年, 罗马尼亚则是2001~2003年。斯洛文尼亚的衰退激烈而短暂, 2003年其私立大学的招生规模减少了几近100%。大部分情况下, 私立大学的招生随后会复苏, 但除了保加利亚之外, 极少有国家能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私立大学招生仍呈下降趋势的只有拉脱维亚和匈牙利两个国家。因此, 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 私立大学招生下降所持续的时间是有限的。

私立专科学院的招生情况

私立专科教育的供给也需要被审视。在这些提供短周期学位和证书教育、常常被称为职业学院的低层次职业导向型高校中, 招生规模的增长 (经常是大规模的) 而非衰落往往更常见。在大多数国家, 许多这种学校都是在政治巨变之初就建立的, 往往规模较小, 主要进行教学活动, 其专业范围也相对狭窄, 偏重于管理学、市场营销、经济学、农学、金融保险、旅游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戏剧学等职业导向型专业。它们主要是以学

生为导向的,与劳动力市场紧密相连并区域性对口。在中东欧一些国家,私立专科教育的招生显示出更强的适应性,比如保加利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2004年5月~2008年9月,这类私立学院在保加利亚和立陶宛的招生增长幅度达到208%,在拉脱维亚达到74%。在拉脱维亚,这类专科学院的数量显著增长,翻了一倍。而在捷克,这类学院的数量仅略微增长了3%。

在中东欧若干国家,私立专科教育的发展在整个区域内外形成了一种新兴趋势。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多个,比如创造广泛而多样化的终生学习机会的必要性,越来越多成年人对再训练和继续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家为更多人提供大规模教育的经济能力降低,以及将高等教育供给与职场联系起来的必要性。

尽管如此,私立专科教育的增长并不是中东欧的普遍现象,其招生减少的情况也有发生。2002年爱沙尼亚私立专科高校的招生增长了63%,随后便持续衰落,直到2005年

后才缓慢恢复。类似的例子在拉脱维亚与斯洛文尼亚也有发生,而过去几年这类高校在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招生也在下降。当然,在中东欧地区,私立专科教育的规模总体上很小,其衰落或发展很少能对整个高等教育产生强烈影响。

私立高校的适应力

中东欧各国为了寻求最佳方案以解决需求量大、资源有限以及人口趋势发生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而做出了不懈努力,各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性恰恰反映了这一点。综观整个地区,私立高校相对而言是新生事物,但在增加教育机会、满足教育需求上举足轻重。其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在范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然而在私立大学与私立专科学院都有出现,在私立高等教育总体招生上也偶有发生。尽管如此,私立大学与私立专科学院得情况虽然各有不同,但这一地区的私立高等教育仍然有适应力,特别是在私立专科教育领域。

泰国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

Prachayani Praphamontripong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PROPHE 项目成员

电子邮箱: prachayani@yahoo.com

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其招生份额曾一度达到占高等教育市场总额 20% 的高峰,并持续了十年。然而自 2002 年开始,私立高等教育开始停滞不前,大学和专科学院的招生都开始下降。到 2007 年,私立高等教育的市场份额仅为 10%,而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类型公立高校的招生份额都增加了。唯一的例外是公立开放录取大学(Open Admission University),从 2003 年起,开放录取大学招生数的绝对值就在下滑。对于上述情况,私立高校的领导者推断,公立高等教育的扩张和私有化是导致自己市场份额下滑的主因;而他们的对手,公立高校的领导者则认为,私立高校份额的下降主要与国家人口变化有关。

公立高校的扩张

私立高校对公立高校的快速扩张非常担忧。这种忧虑出现在公立高校开始增加其分校时。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起,设立分校就成了公立高校的流行做法。分校主要设在中学或者购物中心,提供全日制或非全日制课程。邻近地区私立高校的课程,这些分校也有提供。这种几乎没有任何入学门槛的公立高校扩张方式,与泰国以及全世界的需求导向型私立高等教育具有相似的特点。然而,这种私立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需求快速增长状态已然不再。因此,扩张的公立高校拉走了原

本属于私立高校的需求。与此同时,私立高校曾经是被禁止设立分校的,直到 2007 年的《私立高等教育 2550 法案》才解除这一禁令。虽然如此,想要扩张的私立高校仍然被各种制度所妨碍,当局在许多方面仍严密监控着私立高等教育。结果,只有少数私立高校设立了分校。

不仅如此,在公立高校未扩张的地区,由于一些公立专科学院升格成了大学,仍然导致了私立高等教育的衰落。典型的例子是皇家学院(师范学院)和皇家理工学院。二者在 2003 年都被升格为大学,因此扩大了公立高校的招生份额。

泰国政府支持公立高校在中央大学招生系统(Central University Admissions system)中提高招生名额的政策,也是私立高等教育面临的另一个挑战。这些政策虽然没有特意要打压私立高等教育,但却对私立高等教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私立高校普遍抱怨道,大部分公立高校不止进行一轮招生,而是在第一轮之后继续接受申请,因此延长了招生时间。这对私立高校招收有潜力的学生构成了极大的影响。最终,更少受限的公立高等教育的扩张使私立高校饱受影响。

公立高校的私有化

公立高校私有化是公立高等教育扩张的另一面,对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造成了挑战。

私有化为公立高校带来了管理自治与选择权,从而使公立高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能更有效地行动。虽然私立高校比起传统的公立竞争对手往往更灵活、高效和迅速,但是一旦公立高校获得了自治权,两者之间的差距就缩小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公立高校的私有化使得它们能将自治与自身的财政优势结合在一起。私立高校没有获得政府的任何直接资助,而所有公立高校每年都从政府得到运营经费。公立高校在自治之后,仍然获得政府的预算支持,但却不再受制于陈规。由于有了政府的一揽子拨款,自治的公立大学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经费分配。在财政资助和自主管理的双重作用下,公立高校在市场竞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

尽管如此,只要政府对公立和私立高校一视同仁,一些私立高校也不会受公立高校私有化的困扰。然而,比起公立高校,私立高校通常受到的管制更多。

进一步衰落?

泰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改革已经给私立高等教育带来了损失,而私立高等教育的份额是否会继续降低,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主要包括公立高校

的扩张、公立学院升格至大学以及公立高校部分私有化。就公立高校的扩张来讲,泰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覆盖了56%的适龄人口,因此高等教育体系也许已没有太多扩张的空间。另一方面,从全球特别是该地区的情况来看,高等教育的扩张主要是发生在私立高等教育方面。泰国私立高等教育的份额(10%)远低于东亚地区私立高等教育的份额(38.6%)。泰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是再现当年的增长,还是继续衰落,目前尚未可知。

其它变化也给私立高等教育带来了挑战。对于私立高校当前的招生困境,公立高校并不认为责任在己,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人口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人口持续下降。有统计表明,泰国10~24岁的人口数量正在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减少。人口的下降将会尤其打击需求导向型的私立高校。就像东亚的情况一样,这种类型的高校是私立高等教育中数量最多的,学校规模都较小,通常是学生最不想要的选择。泰国的需求导向型私立高校有多少能在需求的萎缩中幸存,特别是在公立高校保持扩张的情况下幸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问题。

印度的新高等教育认证法

Pawan Agarwal

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高级公务员

电子邮箱: apawan08@gmail.com

在印度,高校的数量正在空前增长。在过去的五年里,大学增加了200所,总数达525所;各类专科学院增加了8,000所,总数达25,950所。这种超乎寻常的增长带来了人们对质量的担忧。建立于20年前的自愿性认证正在努力展示其生命力,但迄今为止只有不到1/6的专科学院和不到1/3的大学接受了该认证。如此低的认证率并不只是因为该认证无法提供服务,而是因为是否接受认证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显得价值不大。大多数高校也不愿意自觉接受认证。

新的认证法

最近,印度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新的高等教育认证法。根据该法案,所有的高校和专业可能都必须通过由注册过的认证机构所进行的定期认证。对26,500多所高校和海量的各类专业进行认证,需要很多有能力且值得信赖的认证机构。因此,根据该法案,将设立国家高等教育机构认证监管局,负责认证机构的注册、监管和审查。《国家高等教育机构认证监管局法案》(National Accreditation Regulatory Authority for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ill)的全文可参见http://164.100.47.5/newcommittee/press_release/bill/Committee%20on%20HRD/The%20National%20Accreditation.pdf。

根据该法案,认证机构属于非营利实体,

受国家监管局严格管理,运作资金主要源于收取学校的认证费。认证机构的所有权、管理层与内部章程如需改变,须经监管局批准,而且其认证程序与收费标准也由管理局规定。但是,其认证标准与规范则由相关法定监管机构来确定。已有的两个认证机构——国家认证评估委员会(National Accreditation and Assessment Council)与国家认证理事会(National Board of Accreditation),在注册到新监管局之前也将仍然保持运作。

根据该法案,所有新成立的学校在招生前必须通过强制认证,已有的未认证学校和专业要在三年时间内通过该认证,已获得认证的学校和专业则只需在当前认证有效期结束时再进行认证。法案对不按规定进行认证有严厉的惩罚措施,最高为监禁两年或罚款一千万卢比(约合22,000美元),甚至两者皆罚。不过,中央政府可以规定某些学校免于强制性认证。

该法案将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推到了舞台中央。它一方面规定自治的高校必须依法认证,另一方面则是监管有能力的职业认证机构。新的法案使得注册和认证程序及时、透明、可靠。法案期望通过认证提供关于学术质量的可靠信息,为学生校际流动提供帮助。印度政府渴望通过这一法案,使得其质量保证措施与全球标准接轨。由于支持多家认证机构并存,该法案给高校提供了选择。

尽管如此, 由于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 该法案的实施任重而道远。

实施中的问题

若要有效实施该法案, 需要对其本身尚存的若干模糊领域有清楚的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认证与监管是常常被互用的两个概念。在一些国家, 认证是指由政府部门批准。而印度对认证的理解源自美国, 是指基于同行评议的外部质量保证措施, 致力于保持并改进学术标准。它确保学生在参加一个特定教育项目后, 能获得特定程度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在美国, 认证包含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包括教师)、行政管理及治理结构的考量。在某些专业领域, 还可能有额外的许可评估。印度的认证若要有效果, 则必须建立在一种通行的对学校和专业进行认可和批准的体系之上。然而新的认证法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新的认证法是建立在虚幻的期望之上的。法案假定会出现若干个称职的认证机构, 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对所有的学校和专业进行认证, 并且其后会进行定期的认证。然而由于严厉的认证合格条件, 过程并不会如此顺利。由于害怕被指控, 可能会有更多的学校提请认证, 然而是否全部学校都能马上获得认证却值得怀疑。许多学校和专业仍将未被认证, 并可能面临关门和严厉的处罚。但是由于学生与员工被牵涉其中, 以及通常冗长的指控程序, 学校和专业不可能被轻易关闭。

相较而言, 美国的自愿认证颇具影响, 因为美国政府依据它来决定高校是否有资格获得联邦学生资助, 而后者是大多数学校的重要资金来源。不仅如此, 在未认证学校就

读的学生是不能转学至已认证学校的。结果, 学生只会选择已认证的学校, 而未认证的学校则无人问津, 在还未轮到被指控或强制关门的结局之前便淡出市场了。

可能的解决方法

鉴于需要认证约 26,500 所高校及数十万专业这一工程之浩大, 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质量保证策略显得尤为必要。目前约 90% 的本科生和 60% 的研究生就读于大学的附属学院, 因此这些大学在认证过程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认证的责任可以分担。例如, 各邦文理学院(相对于隶属于由中央政府所资助的中央大学的学院)的认证可以由各邦政府或当地机构实施。除职业性专业之外的各类专业通常不认证, 其质量由对其所在高校的认证程序来保证。这样就可以减轻很大一部分的专业认证负担。

涉及工程、建筑、医药和护理等职业的独立专科学校, 可以由相关的职业机构来认证, 以避免重复劳动。涉及保险、海事等专业的认证, 或许也可以由私立机构实行认证。印度信用评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Credit Rat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India Ltd)已经开始代表作为政府机构的海运理事会(Directorate General of Shipping)对海事学校进行认证了。这样的做法还可以多一些。

余下的大学和学院可以由国家认证评估委员会进行认证。委员会可以重组为五个独立的区域认证分会。基于客观标准, 一些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可以适用新认证法中的免责条款, 采取自我认证方式, 以充分显示其自治精神。因此, 通过有计划的分散管理以及

责任分担方式，新认证法案覆盖所有高校及其专业的目标可以实现。

比起通过法律进行强制认证，出台其他的规定或许会更有实用性。比如可以规定要得到所有类型的政府经费（学校拨款、科研津贴和学生补助），高校必须得到认证。再比如，保证已认证的学校不接受来自非认证学校的转学学生。这样一来，那些不需要政府经费的学校也会选择接受认证。学生选择的力量，将会使认证真正成为强制性的。

结束语

印度新的认证法尽管有值得称赞的目标和内容，但是实现的过程仍将是艰辛而又漫

长的。法案所构想的认证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质量保证措施，而是一项有约束力但却难以实现的政府监管。法案必须依靠将认证与政府经费和学生转学紧密关联来实现，而非依赖重典。全面而有组织的方法和众多的认证机构相结合，才能为规模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印度高等教育提供质量保证。

作者注：本文阐述的都是笔者的个人观点。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笔者所著的《印度高等教育：展望未来》（Sage，2009）。

印度：不完善的改革计划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对于印度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提案，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首府特里凡得琅（Thiruvananthapuram）人们的看法与生活在光彩炫目的新德里（New Delhi）的人们的看法好像略有不同。喀拉拉邦由温和的共产党间断执政超过半个世纪，与印度北部相比，市场导向和商业色彩较淡。该邦居民普遍识字，识字率属印度最高。与邻近的各邦相比，该邦几乎看不到贫穷，令人惊叹。该邦高等教育入学率约1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喀拉拉邦主要输出人力资源，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喀拉拉邦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海湾地区国家工作。该邦1/4的收入来自于这些工作者的侨汇，其中很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

印度政府的改革提案很有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在此之前，一个致力于讨论该改革政策的会议召开了。不出意料，大部分措施都受到了批评。首当其冲的则是对改革的潜在目的的批评。人们批评提案要将印度的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商业化的世界趋势联系起来，而又不加批判地与全球知识经济连接在一起。向外国高校开放印度高等教育体系的议案是国际化的先锋。此外，改革提案还因为一系列问题受到批评：对外国高校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对于外国高校可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于印度公认的停滞不前的学术体系所具有的新看

法。一些人甚至把该提案视作一种“新殖民主义”。

虽然有关外国高校的提议具有最大的国际代表性，但它们的提议只是印度国会一揽子议案中的一小部分。印度宪法赋予各邦高度自治权，包括高等教育领域。然而，现在高等教育体系“听命于新德里”和过度集权的管理方式却饱受批评。针对这些批评，有人提议设立一个强大的自我永存组织来解决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问题，但这样的做法就如同提议设立一个法庭来审判司法体系中的问题一样，没有任何监督。

认证在印度是一个长期问题。几十年前设立的认证机构只认证了印度很少部分的大学和学院。提案提出建立新的认证机制，摒弃旧的机制，但是没有阐明新机制如何工作。提案认识到印度高等教育深受严重腐败之苦，并提出新的机制来防止腐败。若干现有的控制全国高等教育的关键机构，如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和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All-India Council for Technical Education）将前途未卜。

对于即将被实际立法的提案，批评者指出了层出不穷的问题：用词不明确，建立特定机构的计划不完整，对提议设立的委员会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等种种差错。在观察家看来，仅仅从其法律条款本身来说，如果想获得成功，至少也需要一些大的调整。

其它与该改革提案无关的提议似乎也很不切实际。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卡皮尔·西巴尔（Kapil Sibal）富于各种想法与提议，曾经批准在各邦至少建立一所中央大学。西巴尔部长提议扩张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和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这两所印度最顶尖大学的数量，并承诺在短期内建立12所甚至更多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这些提议涉及到多方面的难题。也许最大的难题是人力资源问题，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高质量大学教师来填补这些新学校的师资空缺。事实上，现有的印度理工学院已经面临严重的师资短缺问题，许多大学教师都接近退休年龄。不

仅如此，可用的经费总额不足，也将让这些提议难为无米之炊。

在南方看来，印度高等教育宏伟计划的缺陷一目了然。也许，新德里的权贵精英们认为，廉价而略有不完善的计划可以带来改变。也许他们只是想让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的高等教育体系焕发生机。现今的这套计划，与过去众多不幸的改革提案一样，不会对印度两万多所本科学院带来任何改变，而后者正深陷于官僚主义作风和因循守旧的教学方法之中。这套计划同样也不会让四百多所大学有任何改变。不把握现有大学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改革只会让人气馁，也许就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印度喀拉拉邦：高等教育的公平困境

Philip G. Altbach Eldho Mathews

Philip G. Altbach: 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Eldho Mathews: 印度喀拉拉邦高等教育委员会研究员; 电子邮箱: eldhomathews@gmail.com

对于高等教育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以及高等教育政策选择的问题, 印度喀拉拉邦(印度较小的邦之一)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在印度高等教育中, 这个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线的邦不同寻常。该邦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助于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喀拉拉邦拥有人口3,100万, 其中1/4信仰基督教, 1/4信仰伊斯兰教, 还有一半人口信仰印度教, 这种多种宗教并存的情况在印度也不常见。因此, 喀拉拉邦的案例不仅对印度, 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就算用印度的标准来看, 喀拉拉邦也并不富裕, 其GDP在印度28个邦中排第9名, 然而却是印度教育最先进的一个邦。该邦人民普遍识字, 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18%, 两倍于印度平均水平, 几乎与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的中国持平。在总的高等教育在校生中, 女性超过60%, 是全印度最高的。该邦也因全印度最高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而引以为豪, 其平均寿命全印度最高, 婴儿死亡率则最低。

喀拉拉邦在政治上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案例。邦政府是由印共(Communist Party of India)主导的执政联盟。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 共产党政府几经浮沉, 造就了今天的喀拉拉社会。喀拉拉邦是世界上第一个选举共产党执政的邦。在执政初期, 共产党政府推动意义重大的土地改革, 强调社会服务、

教育以及收入分配。该邦拥有一个积极的媒体, 在其激烈的辩论中, 提升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廉洁作风。该邦的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协会, 包括高校的教师、学生以及其他职工。有位副校长说, 她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与这个协会保持联系, 为其提供咨询。大部分民众似乎都属于某个组织, 通过组织向广大民众发出声音。

在印度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明显的巨大贫富差距, 在喀拉拉邦的日常生活中似乎更少见。这里的腐败更少, 社会关系总体上也更稳定。

喀拉拉邦错过了印度的“工业革命”。这也意味该邦“错过”了着其它地区常见的环境污染。喀拉拉邦的非正式称呼是“神的国度”, 这也是喀拉拉邦力图建立旅游业的目标之一。喀拉拉邦没有深厚的经济基础, 农业、渔业仍是重要的经济支柱, 与旅游业一样。同样重要的还有输出熟练技工, 特别是向海湾国家输出技工。喀拉拉邦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增强了其劳工对于全世界的吸引力。该邦几乎1/4的GDP都来自于海外劳工的侨汇。目前, 喀拉拉邦的当政者正在推动科技园建设, 期望能吸引生机勃勃的信息技术企业。1990年, 第一个科技园在邦首府特里凡得琅市建立。目前班加罗尔(Bangalore)是印度信息技术企业的中心, 被称为印度的“硅谷”, 而喀拉拉邦正在全力追赶。

混合型高等教育

喀拉拉邦存在着印度高等教育共同的问题,但在改善这些问题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印度高等教育的附属制度将本科学院和大学捆绑在一起,由大学举行考试、制定政策并进行监管。喀拉拉大学(University of Kerala)作为印度第一批建立的16所大学之一,是该邦的最高学府,拥有198个附属学院,约10万名学生。有些学院离大学本部有140公里之远。大部分学院是私立的,由各种宗教团体、社会团体以及其它非营利机构管理,许多依靠政府经费。在基础设施和教学设备方面,这些学院还算是很好的。近年来,私立学院不断增加,主要涉及医学、工程、信息技术、护理和管理学等专业,基本得不到政府经费,许多是准营利性的。这些私立学院给大学的权威性带来诸多问题,因为大学被要求与这些质量存在问题的学院成为从属关系。接近一半的附属学院(该邦附属学院一共797所)由私人管理,并由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少数派的社团或来自这些社团的个人提供赞助。

大部分学院以及大学院系的设施设备低于国际标准,实验室陈旧不堪,信息技术设施十分初级,图书馆不足。除了监管附属学院,大学还提供研究生教育。该邦所有的高等教育专业都是用英语教学的。

高等教育政策

与印度其他邦相比,喀拉拉邦发展高等教育的做法是有一些独特之处的。该邦大部分高校曾经都是由邦政府指导并资助的。然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最近十年。财政资源紧缩迫使大学改变了优先级。

虽然印度中央政府总是忽略喀拉拉邦(除了少数例外),但由于中央政府承诺在各邦至少赞助一所中央大学,因此决定在喀拉拉邦北部的偏远地方建立一所中央大学。这也为邦内多数高等教育专家所不解,因为将大学建立在如此远离学术和城市中心的地方,似乎很难成功。

邦政府坚持平等主义哲学,对邦内所有大学一视同仁,也从不认定任何一所大学为“旗舰”大学。因此,邦内很少有蜚声海内外的大学。柯钦科技大学(Coch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个例外。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认为该大学非常卓越,并支持将其升格为印度理工学院。然而反对将其转变为印度理工学院的运动迫使当局不得不将这一计划束之高阁。由中央政府建立的印度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最近也在特里凡得琅市建成。特里凡得琅的Sree Chitra Tirunal医科学院(Sree Chitra Tiru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Sciences & Technology)是另一个例外。这所学院与大学一样,可以授予医学及健康护理的研究生、博士学位,培养博士后,并由印度科技部直接管辖。特里凡得琅市的印度科学教育与研究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成立于2008年,也可被视为一所国内卓越的研究院。它是隶属于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的自治学院。从政策层面考量,如果这些院校能紧密联合甚至合并,则有可能建立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会更有助于喀拉拉邦的发展。

一些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本科文理学院,如特里凡得琅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或柯钦的王公学院(Maharaja's

College), 也能吸引一大批优秀学生。但这些学院的设施远远称不上世界一流。不过, 大部分顶尖学生更青睐工程、医学以及商务类职业课程。如今, 喀拉拉邦拥有 96 所工程类学院, 其中 90% 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招生, 但只有 11 所是政府赞助的。在 96 所学院中, 60% 是纯粹的私立院校。总体来说, 这些院校的设施还比不上整个邦的平均水平。

喀拉拉邦进行了若干意义重大的改革。这些改革是由中央政府建议的, 但目前并没有在全印度广泛进行。改革包括学期制度改革和传统本科考试改革, 通过增加更多与课程紧密结合的考试, 提供更好的成绩评定体系。改革要求在这方面进行重大变革, 如课程组织形式, 课堂教学方法以及对学生的评价方法。政策制定者希望最终对教学有所促进。邦政府设立了高等教育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Council) 来提供咨询, 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并希望这个委员会成为讨论高等教育问题的平台。中央政府建议所有的邦都设立这样的机构, 但目前只有少数几个邦如是操作。这样的委员会没有权力进行改革, 只是为政府和大学建言献策。

正如所有其它邦一样, 喀拉拉邦正在经历着私立学院和职业学院快速且大规模的无序膨胀。一方面, 人们对高等教育有更多需求, 这些新的私立学院满足了这一需求。另一方面, 许多私立学院质量存疑, 游走在质量控制的边缘, 主要目的在于营利。它们主要开设需求量大的专业, 如管理、信息技术等相关技术领域, 还有一些是医学院。目前为止, 针对这些院校有很多不满和抱怨, 但却没有行动去控制它们。

过去二十年, 虽然高校和学生数量都在

增长, 小学与中学教育质量产生的不公平也在加剧。这种变化的影响很明显, 由中学类别与职业学院升学率之间的关系便可见一斑。政府组织的医学与工程入学考试结果, 也证明了这一趋势。在喀拉拉邦, 要想进入医学与工程院校, 需要参加政府每年举办的入学考试。然而, 毕业于中学教育中央委员会 (Central Board of Secondary Education) 附属中学和印度中学证书考试 (Indian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s) 附属中学的学生往往更容易获得高分。这些中学大部分是营利性的, 不接受国家资助。

入学考试的大多数优胜者来自于社会的中上阶层。他们的父母有财力让他们去考试培训中心学习。这造成了一个状况: 高等教育入学之路因财力基础不同而产生差异。与此相关, 个人与家长的选择成为了喀拉拉邦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今的学生和家长十分清楚, 学业与事业密不可分。而喀拉拉邦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 也加剧了这一现象。全邦超过 80% 的学生都希望进入喀拉拉邦政府高等教育理事会的附属高校。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不断增长也是不足为奇的。

未来之路

以印度的情况做为标准, 喀拉拉邦确实为其相当一部分人口提供了质量尚可接受的高等教育。近年来, 其高等教育已经实行了若干意义深远的改革, 并且高等教育仍被政府与公众关注。其中一些已实行的政策计划可能会有助于进一步改善高等教育体系。

喀拉拉邦的高校在质量、关注点以及经费来源上基本类似。除了少数已提及的例外,

没有一所其他高校在邦内和国内脱颖而出。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差异化，众多高校要有不同的使命、经费来源以及质量。喀拉拉邦至少需要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一所可以吸引邦内最优秀的学生，名列印度顶尖大学之列，并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这在有着强烈平等主义传统的喀拉拉邦并非易事，但如果喀拉拉邦要全面参与 21 世纪全球知识社会，就必须采取这一政策。或许，由喀拉拉邦大学与特里凡得琅市若干有名的科研院所以及柯钦科技大学合并，是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性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大学可以被忽视。在这些大学中，一些大学可以主要专注于教学和为特定地区服务，而一小部分专注于科技的大学则可以保持一些研究任务。

与印度其它地区一样，喀拉拉邦那些附属于大学的大量学院不仅必须被适当地指导，同时也要被给予创新和自治的空间。没有政府资助的私立学院大部分是营利性的，其大量增长产生了特殊问题。或许，一个由高等教育委员会和其它政府机构主导的有效认证体系，可以为所有学院提供基本的质量标准，并减轻大学的负担。

喀拉拉邦的大学有潜力让该邦向知识时

代的跨越。它们可以为从事信息技术及其它知识型行业的新一代劳动力提供培训。喀拉拉邦的劣势在于起步太晚，与信息技术中心班加罗尔差距甚远，虽然印度第一个科技园是建立在特里凡得琅。但是，喀拉拉邦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他们具有努力工作的传统和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一起合作的能力。因此当务之急是立即提升工程教育的质量。根据信息技术企业的判断，只有 1/5 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其他还需要额外的培训。如果喀拉拉邦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工程教育，使其毕业生可以立即投入工作，从而免去昂贵的进一步培训，那么它对高科技企业的吸引力将立即得到提升。不仅如此，这些毕业生在国际市场上也会十分具有竞争力。

喀拉拉邦高等教育的未来错综复杂，却也脚踏实地。高等教育的扩张会继续，但由于喀拉拉邦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入学率，其压力也会比印度其它地方少几分。政府必须更加关注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投入更多的资金，不仅将至少一所大学建设成研究型大学，而且要建设一个具有良好分工的高等教育体系。

新书简介

Brewer, Elizabeth, and Kiran Cunningham, eds. *Integrating Study Abroad into the Curriculum*. Sterling, VA: Stylus, 2009. 230 pp. \$29.95 (pb) ISBN 978-1-57922-349-6.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该书作者从美国人的视角,介绍了学生如何获取留学经验的方法。该书讨论了预备课程、语言课程、服务性学习、在校园内发展能力等与留学相关的主题。

Chapman, David W., William K. Cummings, and Gerard A. Postiglione, eds. *Crossing Borders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2010. 388 pp. (pb). ISBN 978-962-8093-98-4. Web site: www.hku.hk/cerc.

该书通过选取与东亚高等教育相关的若干文章,探讨了一系列与国际相关的东亚高等教育问题,如东亚的知识体系、中国的跨国高等教育、二语习得、中国和日本的传统高等教育,以及中俄双学位项目等。

Cox, Rebecca D. *The College Fear Factor: How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Misunderstand One Anoth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2009. 191 pp. (hb). ISBN 978-0-674-03548-5. Web site: www.hup.harvard.edu.

该书聚焦于美国社区学院及其教与学的文化。作者认为,社区学校的教师没有充分理解学生在知识及其它方面的需求,学生对

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该书是在访谈和观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Dill, David D., and Frans A. Van Vught, eds.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terpri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0. 578 pp. (hb). ISBN 978-0-8018-9374-2.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该书聚焦于高校的科研与社会经济和社会创新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讨论了在国家创新战略与政府政策支持方面的学术研究事业(大学科研的焦点)。该书主要是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芬兰等 OECD 成员国进行的案例研究。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也在被讨论之列。

Donn, Gary, and Yayha Al Manthri.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Oxford, UK: Symposium Books, 2010. 176 pp. £24 (pb). ISBN 978-1-873927-31-1. Web site: www.symposium-books.co.uk.

该书聚焦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并详细讨论了阿曼苏丹国的情况。该书的主题是全球化如何影响海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对课程改革、劳动力市场以及全球化等一系列小议题展开了讨论。

Eggins, Heather, ed. *Access and Equit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10. 169 pp. \$45 (pb).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ISBN 978-94-6091-184-2.

该书从多学科视角聚焦于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入学机会与公平这一复杂问题,讨论了历史与文化环境、全球化和入学机会、学生支持机制、干预策略等相关主题。

Fisher, Robert Leslie. *Crippled at the Starting Gate—The Graduate Schools Created and Perpetuate the Gender Gap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Lanham, MD: Univ. Press of America, 2010. 205 pp. (pb). ISBN 978-0-7618-4911-7. Web site: www.univpress.com.

该书认为,美国的研究生院在历史上对女性存在歧视。男性更受偏爱,而且待遇更好。作者认为,美国的研究生院文化应该变得更加欢迎女性以及少数族群。此外,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教师也应该能提升到更高级的职位。

Johnstone, D. Bruce, Madeleine B. d'Ambrosio, and Paul J. Yakoboski,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a Global Societ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0. 224 (hb). ISBN 978-1-84844-752-3. Web site: www.e-elgar.com.

该书由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赞助,聚焦于全球化和国际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问题,讨论了包括教师学术经验国际化、促进留学、吸收留学生、国际科研合作等主题。

Johnstone, D. Bruce, and Pamela N. Marcucci.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Who Pays? Who Should Pa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0. 322 pp. \$30 (pb). ISBN 978-0-9458-9.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高等教育经费资助是国际上较少被分析的问题。该书强调了成本分担及相关资金问题,探讨了包括学费的本质、实施中的学生贷款机制、家计调查及家长对高等教育的贡献,以及高等教育财政缩减的影响等议题。

Johns, Adrian. *Pirac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from Gutenberg to Gate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10. 623 pp. \$35 (hb). ISBN 978-0-226-40118-8.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

该书并不局限于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因此对全世界的学者都有巨大意义。该书对书籍、观点和科学知识的知识产权和学术剽窃做了广泛的历史性分析,讨论了版权的发展、启蒙运动时期的学术剽窃、科学知识的本质及其知识产权,以及数字时代的学术剽窃等议题。

Kehm, Barbara M., and Bjørn Stensaker, eds. *University Rankings, Diversity, and the New Landscape of Higher Education*.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09. 187 pp. \$45 (pb). ISBN 978-90-8790-814-0.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多种多样的大学排名引起了全世界的广

泛关注。该书对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提出了独特的论述,讨论了学术排名的全球性调查,大学的声誉指标和排名,排名的影响,排名及其对大学改革的影响,欧洲高等教育分层状态等议题。

Lazerson, Marv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Success and Its Discontent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 Press, 2010. 221 pp. (hb). ISBN 978-963-9776-79-1. Web site: www.ceupress.com.

该书对当代的美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聚焦于职业主义、管理主义兴起以及学科的角色等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3, No. 5, December, 2010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61, Fall 2010,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Issu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lternatives to the Market.....	177
Access Means Inequality.....	180
Asian University Presses in the Digital Age.....	183
The Conundrums of MBA Rankings.....	185
Discipline and Institution Commitment: Professorial Views.....	187

The “Decline” of the Private Sector

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of Decline i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189
Decline in Colombia.....	192
Ups and Dow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3
Downturn in Thailand.....	195

Focus on India

India’s New Accreditation Law.....	197
Half-Baked Reforms.....	200
Kerala: The Dilemmas of Equality.....	202

New Publications	206
-------------------------------	-----